

这些青年通过中医为跨文化交流开出一剂良方

用英文帮助澳大利亚青年理解“阴阳五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婷婷

“气”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中药的计量标准没有西药那般精确明晰?一位澳大利亚青年向西悉尼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副院长朱小纾教授提出了这些问题。不过,朱小纾并未对其问题予以直接回应,而是通过一场场临床见习帮她领会中医基础知识,感受中医的治疗成效。

从搭建与完善课程体系、组织开展日常教学活动,到指导临床实践……多年来,朱小纾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希望能跨越中西方医疗体系的差异,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助力中医文化走上国际舞台。

让中医文化在海外开花结果

2024年9月,18岁的悉尼华裔青年韦小宜成为了西悉尼大学中医专业一年级学生。回顾这段学习经历,她感到很充实。每绘制一幅与针灸和中草药相关的图片,她便对“中医”这份职业和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核多了一些敬畏。

澳大利亚是最早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之一。当地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和澳政府对自然疗法秉持的开放态度,为中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医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

韦小宜的父亲便是一位中医医师。在成长的岁月里,她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看着父亲为患者诊疗、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她下定决心要成为像父亲一样优秀的中医。

奇妙的是,父母二人的教师都是朱小纾。在海外教授中医的这条路上,朱小纾走了20多年。这是她在海外开启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她愿倾注终生的事业。

“中医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生



朱小纾(右三)带领学生参与户外实践课程。



中医实践课堂上,中外青年观摩针灸疗法。

命观和治疗实践的医学体系,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独特的概念表达。”清华大学外文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王敬慧教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正因其独特性,有些中医概念信息在西方文化中并无直接对应,往往需要通过跨文化翻译、注释和现代科学的支持来使其更容易被接受。

为帮助更多澳大利亚青年理解“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中医基础概念和“未病先防”“调和脏腑”等治疗理念,朱小纾下了不少工夫。

理论讲解时,朱小纾会通过中英文并用、类比西方医学概念等方式帮助学生在熟悉的知识体系中找到理解中医的切入点。同时,她设计了多样的实践课程,让学生在针灸体验、草药识别及临床观察等环节中理解、吸收中医知识。

“当学生亲身感受到针灸的镇痛效果,或是领悟到中医强调的‘因时因地制宜’理念蕴含的原因时,中医的种籽便开始生根发芽,他们对中医的信任感也越来

越强。”她说。

在此基础上,朱小纾会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引入教学,带领学生们细细体会《黄帝内经》中的哲学思想,同时辅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和食序等内容,让学生感受到中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文化差异并不是障碍,它更像是推动理解、启迪思维的动力源泉。只要我们愿意相互倾听、保持沟通,中医文化就有可能在不同文化的土壤里开花结果。”朱小纾说。

中医文化“要走进校园,更要迈向世界”

通过多年的教学和国际合作实践,朱小纾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医的兴趣日益浓厚,接纳程度也逐渐提高。

“许多(西方国家的)患者和医务人员开始主动探索针灸、中药和推拿等传统治疗方法,希望亲身体验其效果。”在朱小纾看来,中医的传播不应局限于课堂和诊室,

也要走进社会。

西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唯一一所拥有全套中医学位课程的公立大学,也是全澳唯一同时拥有中西医学课程的大学。2014年11月,西悉尼大学中澳中医中心成立。作为中澳自贸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中医药在海外传播、造福澳大利亚民众的重要举措。

朱小纾认为,中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国际传播方式。“健康是每个人不能忽视的基本需求,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根基。”因此,推动中医知识和中医文化走进更多国家的校园,不仅是向世界传授先进的中医技能,更是在传播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近年来,朱小纾和中澳中医中心的团队人员也在积极探索多元路径推广中医文化。他们将教育、艺术、科研及社区服务有机结合,致力于让中医以更亲和、时尚的姿态,真正走进大众视野,让海外人士

理解其内涵。

2023年,中澳中医中心联合悉尼皇家植物园策划并举办以“中华本草:隐藏的植物疗愈故事”为主题的展览活动,这场展览同时拥有中西医学课程的合作,将中医药知识、园艺美学、当代设计和文化叙事融合在一起。

看完展览后,许多海外访客意犹未尽。他们告诉朱小纾,这个展览扭转了他们以往对中医“晦涩难懂、遥不可及”的刻板印象。同时,中澳中医中心举办了一系列面向社区的中医健康讲座与公益活动,内容涵盖节气养生、饮食调理和慢性病预防等,受到当地民众和新移民家庭的喜爱。

朱小纾表示,中医文化正处于融入世界的关键阶段,与国内外中医教育机构加强合作尤为重要。目前,她也在与澳大利亚主流医学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国际同行评审的研究数据,为中医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提供证据基础。同时,通过与健康广播平台和媒体专栏合作,持续进行中医知识的科普与正面形象的建设。

“中澳中医中心的愿景不仅是传播中医,更是要搭建起一个以教育为基础,以理解为前提、以融合为目标的中医国际化发展路径。”朱小纾期待中医文化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增进共鸣,不断焕发光芒。

“年轻人是推动中医走向世界的未来”

“我们收到了来自中、澳、美、法等多个国家学生的投稿。”朱小纾介绍称,2024年,中澳中医中心推动了“青年中医传播者”国际短视频大赛,以鼓励学习中医的学生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医。

这是一次拓展中医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播边界的尝试,也让朱小纾和中心的小伙伴们感受到了年轻一代对中医文化的热爱。

德国:巨额负债法案推动国防政策转型

□ 马晓霖 袁媛

3月21日,德国联邦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53:16)的表决结果,高票正式通过由联盟党和社民党共同推动的巨额财政举债法案,这也意味着将对《基本法》(宪法)进行历史性修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在欧洲安全局势日益紧张背景下,德国国防政策已出现重大转型。

该法案已于3月18日在德国联邦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根据议会最新决议,未来德国的国防、情报机构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开支,将仅在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1%的范围内受到“债务刹车”机制的限制,超出该额度的部分将允许通过举债方式筹措。德国议会还通过一项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实现气候中和目标的特别基金,该基金同样未被纳入“债务刹车”限制,总额为5000亿欧元,全部来自借债。

所谓“债务刹车”是德国政府为了防范债务增长过快而制定的一项财政规定,于2009年写入《基本法》。该规定要求德国联邦债务每年结构性新增债务不得超过GDP的0.35%。谁也没有料到,俄乌冲突、美国外交政策剧变及难民与能源等多种内外因素叠加,成为已延续15年的“债务刹车”制度的掘墓人。

代表德国联盟党的候任总理默茨在联邦选举获胜后,放弃了选战期间的一系列主张,在阁僚过程中寻求打破长期以来以国防限制,推动德国向更积极的国防政策迈进,以应对欧洲安全环境恶化。默茨在联邦议会表示,德国乃至欧洲需要实现“防务政策的范式转变”。他认为,目前欧洲仍需

依靠美国共同防御,但未来必须逐步走向自主防务,并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

德国社民党主席克林拜尔认为,新法案的出台是一项“历史性决定”,可能成为“德国和欧洲的积极转折”。克林拜尔认为,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德国必须承担起欧洲的领导责任,德国立法机构的这一决定也释放出明确信号,即德国将竭尽全力维护欧洲的和平。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议会共和制,议会由联邦议院(议会下院)和联邦参议院(议会上院)组成。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枢,联邦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执行,选举联邦总理等国家机构负责人,监督联邦政府工作等,通常每4年选举一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法案在议会付诸表决,是默茨召集已被选下台的第20届联邦议院进行的,因为在新一届议会中默茨缺乏法案通过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在旧议会中的支持总数也达不到三分之二,默茨还需要绿党支持。而绿党一边指责联盟党傲慢和民粹态度“令人恶心”,一边强调不能牺牲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政策,要求默茨有所妥协。最终,作为争取绿党支持的条件,默茨承诺从5000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负债中拿出1000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并将2045年前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写入《基本法》。

默茨对自己在新议会所面临的不利态

势有清晰而精准判断,因为自民党、选择党、左翼党及瓦盟均对提案表示反对。法案通过后,立即遭到非联盟派派的围攻,默茨堪称左右为难。德国各左右党派针对默茨推动议会通过法案的非议,也显示德国政治精英与社会陷入巨大的认知困境。

德国自民党认为联盟党和社民党的提案将使“债务刹车”制度形同虚设,讽刺政府不再是“大联合政府”而是“债务联盟”,对绿党的妥协使事情变得更糟。德国选择党不满默茨利用已被选下台的联邦议院进行投票表决,指责他并不关心国家未来而只在意总理权位。德国选择党认为德国并不需要所谓的“战争能力”,应避免树立新的“敌人形象”,保持了标榜回归德国自身利益的一贯立场。德国左翼党指责默茨欺骗选民,指出“债务刹车”制度曾是其竞选核心承诺,如今却自食其言,还借助议会通过新法案而限制新议会的政治决策权,认为军备扩张无法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安全,进一步扩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从德国左翼党分裂出来的新党瓦盟认为,俄乌冲突后欧洲安全形势变化、特朗普归来后美国可能重新评估其对欧洲军事承诺等,均不构成德国扩军的理由。该党相信美国只是希望通过欧盟尤其是德国加强军备以减轻自身负担,而目前欧盟北约成员国军费支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几乎是俄罗斯军费的4倍,因此,德国应停止对欧

武器供应,避免卷入战争,并采取缓和的欧洲共同安全和裁军政策。瓦盟提出,德国作为欧洲中等强国,既无安全能力也无经济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挑战核大国,应致力于与所有大国建立良好关系。

事实上,德国联盟党、社民党及绿党合力通过的法案与当前国际安全局势联系密切。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其对外政策变化,包括对欧洲加征关税、企图强取丹麦格陵兰岛、妄图独霸乌克兰矿产资源等进攻性外交,大大加剧了德国乃至欧洲的紧张感和不适应。这一突变使欧洲特别是以欧洲“稳定器”和“领导者”自诩的德国认为,必须尽快作出明确回应,加强战略自主,增加国防支出,并加强国防、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投资。瓦盟的提议被议会多数驳回,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从外交层面看,德国国防政策调整不仅源于内部政治力量的变化,也是对欧美关系恶化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曾试图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其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收效甚微。面对美欧关系的不稳定性,德国不得不主动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因此推动宪法修正案,为未来的军事发展提供财政支持。观察家们认为,德国的防务扩张不仅仅是短期应对俄乌冲突的举措,更可能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的长期变化。德国国防预算增加也许会成为欧盟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最终推动整个欧

洲的防务体系转型。

从更深层和更宏观的视角看,此次德国巨额举债方案获得通过背后有多重因素推动。

其一,欧洲安全环境的恶化。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在战争初期对乌克兰仅提供防御性装备。随着战事升级,德国已成为乌克兰武器供应的主要国家之一,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和财政援助。德国政府称,援助总额约为440亿欧元。特朗普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任何可能,并在强逼乌克兰“割地求和”,这使德国乃至欧洲对美国这个坚强盟友和长期“保护伞”失去信心。美国对乌克兰的“始乱终弃”,形成了巨大的“寒蝉效应”。

其二,美欧防御关系的变化。在今年2月举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对欧洲的民主制度和移民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欧洲正逐渐背离其核心价值观,质疑欧洲是否值得美国继续保护,强调欧洲国家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而不能依赖美国的持续投入。万斯这番政策宣示,以及特朗普政府针对俄乌冲突的反向操作,使欧洲国家意识到已不能指望,至少无法完全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战略自主、外交独立和武装自卫,已是德国和欧洲的不二战略选择。

其三,国内政治氛围的转变。德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军事化持保留态度,二战后形

抛开欧美滤镜干扰,中国与中东才能真正“民心相通”

□ 张 晨

赴美国留学10年有余,那是我唯一一次在人境时被美国海关扣留在“二次审查”区。这个被俗称为“小黑屋”的地方拥挤嘈杂,设施简陋,只是简单放置着几张没有靠背的长椅以供我们挤一挤、抬眼望去,拘留室里清一色都是来自中东、南亚、东亚、拉美、非洲的有色人种,我身边甚至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南亚裔残疾老者。我有好奇,这样一个垂垂老矣的残疾人,是怎么威胁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的呢?在拘留室另一头的角落,我终于看见了两个被押头的白人旅客,我苦笑一声暗想:“这算不算美国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有一点点进步呢?”可是几秒钟后,当他们路过我身边时,我分明听见他们说的是俄语,于是我刚刚那不容易给予的那一点点积极评价悄悄地碎了。

被无端扣留3个多小时后,终于轮到我被盘问。对方要求我列举自己旅行过国家的名字。当经历了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与3个多小时扣留的我终于可以离开拘留室时,我挤出一个疲惫的苦笑,平静地问道:“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告诉我,你们究竟对什么地方有怀疑呢?”海关官员坦诚地说:“你去过的‘奇怪’中东国家太多了,你一个哈佛大学的在校生,在学校里做中东研究还不够吗?”听完这个有趣的问题,我苦笑无言,转身凝眸远眺,视线透过高墙的窗扉与山川的阻隔,眼里满是安曼重叠叠嶂绵延,伊斯坦布尔万里碧涛映长空,贝鲁特旧时洋楼含羞掩尘缘,埃尔多安人间烟火情缠绵……

如果真要回答上述这个问题,我会毫

不犹豫地说:“是的,通过欧美学界了解中东是不够的。”赴美求学10余年,即便是曾经求学于哈佛大学这个美国从事中东研究历史底蕴最深厚、学术资源最丰富的学府,我仍旧感到自己平日所学被掺入了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偏见。我曾经攻读中东研究的哈佛大学为例,无论是教材的选择还是教授课堂上的讲座内容,总体而言都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叙事的框架内来回打转,而对于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对手的描述,要么停留在一笔带过的笼统阶段,要么进行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和妖魔化描写。常常张口闭口将自己放到道德高地上,颐指气使地批判非西方国家人权状况的欧美学界,似乎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反思过去20年来,中东地区愈演愈烈的反美浪潮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经纬与民意基础,而仅仅选择躲在自由主义象牙塔的舒适区内用“威权主义”“恐怖主义”“麻烦制造者”等口号意味十足的标签,来概括一场场复杂的政治社会运动。

坦白地说,我在美国高校圈中交往过的许多中东裔学者也给我一种强烈的撕裂感。这些人都是中东族裔,但或许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局限,亦或许出于想要给美国主流社会递上一份表忠心的“投名状”的功利考量,对于老生常谈的西方自由主义框架不仅不加以纠正,反而大肆推广。在哈佛时期我就曾经遇到过有阿拉伯裔教授将中东国家简单概括为“威权主义”,然后花整整

一个学期来大肆鼓吹西民主化、讨论如何推动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更迭;我也曾遇到过美籍伊朗裔教授出于自己极端反伊的政治观念,在课上频频跑题兜售诸如“伊朗政府会通过监控我们的手机,来把那些在海外不戴头巾的妇女们合照的网友们抓起来”一类的毫无可信度的阴谋论。而这些学者,对于美式意识形态的谄媚,也往往对中国怀有深切的偏见乃至敌意。

彼时的我已经开始对欧美学界灌输给我的知识体系有所质疑,但是又说不清楚问题究竟何在。毕业后,我作为访问学者受邀前往土耳其最负盛名的两所名校——海峽大学、科奇大学,并在土耳其生活了近两年。在这两所名校,我惊讶地发现一些态度其实非常友华的、欧美教育背景出身的教授,在课上描绘的中国现代史似乎有些负面。原来,他们使用的授课材料都是欧美学者所著的英文教材!欧美“中国研究”界对于我国的政治制度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妖魔化由来已久,而这些西方偏见浸泡过的种子被中东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加批判地拾走,在他们本国学界的土壤里长出了欧美同款的罂粟花,进而造成了这些中东国家知识分子对华的长期误解。

那一刻我猛然惊醒,我自己岂不是与他们一样一叶障目?通过英文著作、英文媒体、欧美高校,以及那些在欧美发展的中东裔学者的滤镜去研究中东,这与那些教授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开始尽量撇开欧美叙事的滤镜,尽量在中东地区实际生活并进行田野调查,直接与中东人的长期接触中建立自己对于中东地区的认知。2023年年底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我国也不例外。而我国一些学者与媒体长期以来习惯于通过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了解中东事务,因此不仅自己了解的都是经过欧美筛选、符合欧美叙事的信息,并且还不经意间成为了这些欧美叙事的传话筒,有意无意地渲染了“战争将以以色列的速胜告终”的论调。

相反,我在2024年旅居约旦近两年,近距离观察了数次安曼群众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集会乃至警民冲突,观察到加沙的武装组织不仅在加沙与约旦河西岸有着坚实的基层权力网络,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的影响力渗透到约旦这个传统美国盟友的社会中,尤其是在约旦青年人的心中有着惊人的地位。同年7月,我受邀前往贝鲁特,而我离开贝鲁特还不到一周,以军就对当地发动了第一轮空袭。在贝鲁特,我走访了著名的萨巴拉与沙提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在难民营的所见所闻更让我直观地了解到巴勒斯坦各政治组织在侨民基层组织方面的实际控制力,更加坚定了自己“以色列摧毁抵抗组织的目标根本就不现实”这一判断。

在贝鲁特,我有幸采访到常年从事冲

突调解的联合国官员,与其一道参观了南郊的达希亚区、什叶派聚居的达希亚区基础设施建设破败不堪,与基督徒聚居的市中心之间有着刺眼的反差。达希亚区的民生问题几乎完全依靠当地的什叶派武装进行解决。对于黎巴嫩国内的什叶派武装,过去学界往往只关注其外交政策上的反以路线,但却往往忽视了其本质上更是一场剑指黎巴嫩国内财富再分配的草根运动。只有亲自来达希亚亲眼看一看,才能意识到这些武装组织真正的生命力恐怕并不在于南线作战的得失,而是植根于黎巴嫩国内的现实,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黎巴嫩人物的遇刺或战死并不会导致整个组织的瓦解。

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在黎巴嫩,我遇见的市民,无论宗教派别,都对保卫南线国土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我打车时曾遇到一位淳朴和善的司机老叔,他的车老旧不堪,但收拾得甚是干净。他将自己儿子的照片当作挂件放在车上,一边露出温暖的笑容,一边亲吻着儿子的照片告诉我,相片里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参加抵抗组织,并埋骨南土。我一声叹息,还来不及说出一声“节哀”,他却神色一凛,告诉我:“他虽往生,我还有3个儿子,他们也都已经上了南线的战场,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儿子,我们会继续抵抗,直到胜利!”无论一个人对于中东各国间恩怨的是是非非持怎样的立场,当看到这位一身清贫却努力拉车以谋生、位卑却不敢忘忧国的老人家,炯炯有神

成的“和平主义”传统使军费增长一直是敏感话题。然而,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导致德国民众对增强国防能力的态度发生历史性倒转。

其四,德国联邦国防军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短缺。近年来,德国联邦国防军饱受资金短缺、装备老化和人员不足的困扰,军队职位空缺,武器装备长期无法得到更新。此外,德国陈旧的基础设施也亟待翻新。

其五,德国经济与社会困境凸显。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长期以来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结构性问题全面暴露,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4年上半年,德国私人家庭平均每月千瓦时天然气费用与2023年下半年相比上涨4%。尽管价格比峰值略有下降,但仍然比俄乌冲突前高出73.8%,预计2025年还将继续攀升。此外,持续的难民危机也给联邦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尽管德国政府已大幅削减难民接收和融合费用的预算,仍面临不小挑战。

德国的国防政策因俄乌战争而产生争议,因美国调整对欧对俄政策而将争议转化为主要共识,进而完成了战后最大规模的调整,从长期低投入和防御性思维转向更具主动性的防务战略。德国财政改革正成为其国防政策系统化转型的关键动力,通过增加国防预算和重新定义财政结构,德国试图在应对国内外安全挑战的同时提升自身战略地位。考虑到德国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在全球安全格局变化中,德国的角色将如何重新定位引人深思,德国将向何处去也令人关注。

(作者马晓霖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袁媛系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国际区域研究院研究员)

眼神里闪烁着对于胜利深信不疑的光芒时,都不可能不为之动容神伤。而目睹这一切的我也更加确信,与媒体报道里“以色列已经速胜”的叙事截然不同,沙姆地区以巴以、黎以为主线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

旅居中东的日子里,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关于当地的知识,与此同时,中东当地的朋友也饶有兴趣地询问我关于中国的一切。加沙冲突以来,即使是约旦、土耳其这样的域内美国盟友,其上层精英与基层群众都很大幅度上因为西方的伪善而对欧美恨恨,知识分子与民间反美的情绪都很强烈。我接触的绝大多数中东群众、官员、知识分子都不像欧美人那样动辄对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即使是因为媒体报道而有所误解,也至少非常愿意听我的解释,很多人在与我交流之后改变了看法。在国际问题上,他们更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有炽热的期待,迫切希望中国的复兴可以更多地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在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危机等热点问题上,发挥出欧美国家无法发挥的领导作用。

今年3月,我受一所海外研究机构的邀请在TikTok上录制了一个介绍中国政府和民间在加沙战争上的立场的小视频,视频发布几天内点击率就突破百万,影响远超该机构的其他视频,我也因此收到了许多中东国家学者的鼓励信件。这说明,中国对于中国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但由于渠道有限,一直以来都缺乏了解。如何在中东讲好中国故事将是新时代我国青年学者的一个长远课题,但第一步已然十分明确:无论是我们研究中国,还是让中东了解我国,当务之急都是要抛开欧美滤镜的干扰。

(作者系中东问题青年学者)